

广阔的世界文学大语境下来考察和评价。

但是长期以来,在中国高校的文学学科领域,由于人为的学科分工,使得(世界)文学被分为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两大类,从事这两类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很少在一起切磋交流,这样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研究一度陷入“失语”的状态:研究者不仅不能用准确的国际通用语——英语表达我们的思想,更由于我们所使用的理论概念、范畴和话语几乎都来自西方,只有极少数佼佼者才能兼通中西,在国内国际学界游刃有余,甚至跻身国际顶尖学者的行列。有鉴于此,怎样才能有效地构建中国自主学术话语体系并使之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可?这应该是我们从习近平文化思想中获取的重要教益,同时也是我们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研究学者面临的一个问题。

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拉近了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距离,进入本世纪初以来,世界文学这个久违了的理论概念再度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之于中国文学,它已不再仅意味着我们要大力译介外国文学,从而缩短中国文学与之的距离,而应更注重促使中国文学走向和走进世界。既然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将(世界)文学分为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那么现在就要将其打通,使世界文学包括中国文学,并有效地改变目前文学研究领域内的这种不正常状况。因此笔者认为,我们从习近平的世界文学观获得的重要启示就在于,我们应该从仅从事“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转向从

事更广泛的“世界文学”教学和研究,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国文学。即使是从事某个单一的外国国别文学研究,也应该有一个独特的中国视角,这样国际学界才有可能对中国学者的研究给予一定的重视。中国既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华文明既然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延续了几千年且从未间断的文明,中国文学就理所当然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学课程中,讲授世界文学不包括中国文学显然是行不通的,这与中国的传统也不相符合。

早在先秦时代,面对各诸侯国纷争的局面,中国的先哲便提出了一种“天下观”,认为可以通过扩张和征服来实现天下(世界)的统一。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类似于古希腊的世界主义的不同版本。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将其具体化了。可见,古代中国的先哲从来就没有将中国与世界隔绝,而是自认为居于世界的中心,也即所谓的“中央帝国”(Middle Kingdom),所以现在我们提出将外国文学回归到世界文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回归到原初的逻辑起点。

人们也许要问,笔者为什么要提出这一“转向”?它对我们当下全球唱衰文科的情势能起到何种反拨作用?再者,它之于我们的文学研究有何助益?笔者认为我们现在提出这一“转向”主要有下面三个理由。

首先,我们主张以世界文学来代替外国文学,可以借助于这个平台将中国文学也纳入世界文学教

学和研究,这样便可以使我们的学生了解世界文学的全貌以及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大语境下究竟处于何种地位。

其次,我们可以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背景下,以世界文学的经典作家作为参照,对中国文学及其作家作品的成就及原创性特征作出准确的、恰如其分的评价。

最后,有了世界文学的背景作为参照,我们就可以像自然科学学者那样,将自己的文学研究论文不仅首先发表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同时也可以在世界通用语英语改写后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由此,我们就真正走向世界而且走进世界了。

总之,习近平的世界文学观不仅对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教学和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它本身也可以作为一种独特的原创性理论在国际学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可以说,本文的探讨仅仅是一个初步的尝试。**H**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艺术理论与实践研究”(23ZD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